

考古现场航拍

曹休墓

一枚铜印揭示墓主名将身份

近日,“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幕。在诸多精品文物中,一枚铜印引来不少观众围观。它是出土于洛阳的三国时期曹魏大司马曹休的私印。

200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连霍高速洛阳服务区东侧调查勘探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该墓葬坐落于东汉家帝陵陵园和朱仓东汉帝陵陵园之间,位于东汉陵园的核心区。墓坑南北宽21.1米、东西长15.6米,墓坑东侧的中轴线上还延伸出了一条长35米、宽9米的斜坡墓道。

随着发掘工作不断推进,现场考古人员发现,该墓葬形制复杂,除了拥有斜坡墓道,墓室还被分成了甬道、前室、后室、耳室、北侧室和南侧室,各墓室全部采用砖券拱顶,前室为前堂,后室、北侧室、西南侧室分别安葬墓主人和合葬者,东南侧室和耳室为器物间。

该墓使用楔形和条形两种墓砖,最大的墓砖长46厘米、厚10厘米、重50公斤。在楔形砖上发现有“第一”“第二”“第三”“左”“右”等朱书文字,且位置排列有序。在一些砖上,还发现了戳。考古专家推测,这是建材质量保证的一种体现,也意味着这座墓葬的建造不是个人行为。

虽然位于东汉帝陵核心区,但是这座墓葬有着明显的曹魏时期特点,墓葬上面没有前朝墓葬流行的大型封土堆和陵寝建筑痕迹,墓下有槽沟,是典型的薄葬墓。与墓道朝南的东汉墓葬不同,它的墓道朝东,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结构推断,这是一座东汉晚期到曹魏时期的贵族墓葬。根据史料记载,公元190年东汉京都洛阳遭董卓之乱,官阙皇陵被洗劫一空,一把大火烧得洛阳方圆200里内宫庙尽毁,鸡犬不留。考古专家推测,东汉皇陵被付之一炬变为废墟,或许成了后来这座大型墓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遗憾的是,这座墓葬被盗严重,墓室及甬道上方共发现从唐宋到近代的6个盗洞。目前出土的随葬品数量很少,除了在南侧室出土经修复成形的四系罐等多件陶器,前室角落还出土一枚鎏金铜带钩及重250克的铜钺。

这会是曹休的墓吗?考古人员在清理发掘的过程中充满了期待。不久,大家在墓葬后室发现了

一枚边长2.4厘米的桥形纽方形铜印,随着附着在上面的泥土和绿锈被一点点清除,印章上刻画的篆书白文让人眼前一亮:曹休!考古专家一致认为,这枚铜印应是墓主人的私印,为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根据《三国志》记载,曹休作为曹操族子,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开始随曹操征伐,他经历曹操、曹丕、曹睿三代,率军打仗战功卓著,官至大司马,是曹魏的高级将领,位在三公之上。而在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曹休与吴军战于石亭,遭遇惨败。他上书朝廷谢罪,魏明帝虽不予追究,但他仍惭愧愤恨,疽发于背而死,被葬于洛阳邙山。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曹休墓是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和墓主人姓名记载的曹魏时期贵族大墓,对认识东汉、曹魏时期墓葬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报记者 智慧 通讯员 郝君涛
(本文图片由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铜印



铜带钩



我市49件文物亮相韩国

本报讯(记者 智慧 通讯员 黄超)昨日,记者从洛阳博物馆获悉,由洛阳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共同策划的“交融·魅力——北魏鲜卑拓跋部的历史足迹”展览在韩国汉城百济博物馆开展,我市49件文物亮相。

该展览是2021“中韩文化交流年”的重要文化活动,也是今年我国仅有的两个出国交流展览项目之一,将持续至明年2月27日。展览精选洛阳杨机墓、呼伦贝尔嘎仙洞、大同司马金龙墓等墓葬出土的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85件(组),讲述了鲜卑拓跋部从嘎仙洞出发一路南下到达盛乐、平城,最终定都洛阳的历程。

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它结束了我国北方的混乱局面,吸收、融合了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制度、经济、宗教、艺术等方面呈现新面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展览现场,精美的文物引来不少韩国观众“围观”。洛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参展的文物主要来自北魏重臣杨机的墓葬。杨机祖籍秦州天水(今甘肃天水),其祖父在北魏初年将家搬到洛阳,杨机生于洛阳、长于洛阳。杨机颇有志向和气节,24岁时就做了河南尹功曹,后担任过平南将军府长史和洛阳令等职,是一个为政清廉、公正无私的官员。

上述负责人表示,该展览是首次在韩国介绍“北魏拓跋鲜卑”在中国的迁徙历史,不仅介绍了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变研究的新成果及考古发现的新资料,也介绍了鲜卑拓跋部历经我国内蒙古、山西、洛阳三地发展壮大后的演变进程。下一步,洛阳博物馆将继续与国外文博机构开展合作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本文图片由洛阳博物馆提供)



参展的彩绘陶文物

周六历史文化讲座 为您解读北宋墓志

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本周六将带您走近出土于洛阳的北宋王贻孙墓志。

本期讲座邀请到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黄甜,她主要从事宋辽金史、中国日常生活史、河洛文化、黄河文化的研究。黄甜博士将结合文献史料对墓志内容进一步考释,以期大家对墓志的史料价值有进一步的认识。

讲座时间为本周六(12月25日)15时至17时,地点在洛阳市图书馆一楼第一报告厅(洛龙区龙门大道71号)。本期讲座限报名99人(接受团体预约,详情请拨打电话0379-61289178咨询)。有意参加的观众可通过“洛阳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观众请自备防护口罩,入馆前将进行体温检测、“洛康码”核验。

本报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张炜



广富林陶尊“图画”与夏代早期文字

□蔡运章

夏代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当时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这个时期我国的周边地区,是否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在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广富林村发掘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腹部刻有一幅“石钺(yuè)麋鹿图”的陶尊,引起学术界特别关注。

广富林陶尊“图画”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资料显示,这件陶尊腹部“以刻画技法画了一幅梅花鹿石钺图。一只梅花鹿长着两只角,惟妙惟肖,旁有一件带柄的石钺。柄向外弧曲呈未张开的弓形,柄下端还安装着铆。旁边还有一图,可惜大部分磨损,从残存字迹看似一鹿”。

考古专家宋建先生指出,以往在史前器物上单独出现具象或抽象的“鹿”和“石钺”图形,并不罕见。但是,将“梅花鹿和石钺两种图形组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史前器物上“还是第一次发现”。因此,这件陶尊“图画”的发现,为研究夏代早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教习俗和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广富林陶尊“图画文字”解读

我国古代将体形硕大的鹿称之为“麋”。因此,这件陶尊腹部前一“鹿”形图画可读为“麋”,而后一残图当是“鹿”的象形字。我国古代文献里,“麋鹿”并称的现象,不乏其例。考虑到古人自右向左的书写习惯,故这幅“梅花鹿石钺图”,称之为“石钺麋鹿图”更为恰当。我们认为,这幅刻画图画应是表示其载体名义和用途的“图画文字”。

陶尊是古代祭祀神灵的礼器。钺是中国古代常用的杀伐刑具,其中的大钺则被作为王权的象征。《尚书·牧誓》说:“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周秉钧注:“钺,大斧也。饰以黄金,故曰黄钺。”《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即位时,“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由此可见,石钺常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具体象征。

“麋”指体形硕大的鹿。麋鹿是夏季进献王府的重要

猎物。据《周礼·天官·庖人》记载:“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称。”“六兽”郑司农说是“麋、鹿、熊、麝、野豕、兔”六种野兽。同书《兽人》载:“掌豜(gū)田兽,辨其名称。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这是说兽人职掌用豜捕捉野兽,分辨捕获物的名称和毛色。冬天进献捕获的狼,夏天进献捕获的麋鹿,春、秋二季进献各种野兽。麋鹿性情温顺,肉质鲜美,数量众多,容易捕获。这就是古人将其列为田猎对象的重要原因。

麋鹿本是麒麟的原型,常被称为“仁兽”。《说文·鹿部》说:“麒麟,仁兽也。”又说:“麟,大牝鹿也。”这就是中华先民常用“麋鹿”来祭祀神灵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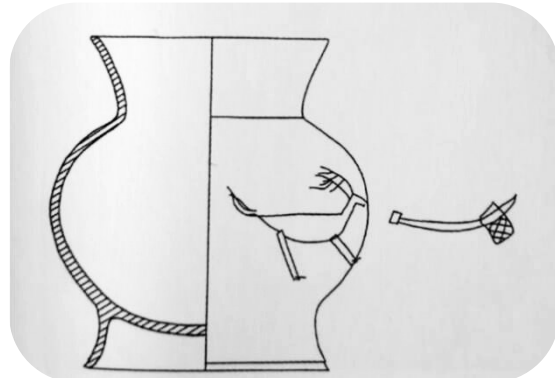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这件陶尊腹部刻画“石钺麋鹿图”的大意是说,用斧钺捕杀麋鹿来祭祀神灵。因此,这幅“图画文字”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当是这件陶尊的标识性图画。

广富林陶尊“图画文字”的重要价值

这件陶尊属于广富林文化的遗物。广富林文化是环太湖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其文化内涵却“表现出大量的北方文化特征,结合碳十四数据,其年代为距今4100年至距今3900年”。也就是说,这件陶尊腹部所刻画“石钺麋鹿图”的年代,当在夏代早期。

“图画文字”是人类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林耀华先生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指出,“公元前4000年末,古巴比伦苏美尔人”,已开始使用“图画文字”。马克思指出,“图画文字”似乎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出现的。

仰韶文化时代,正是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说明仰韶文化先民,使用“图画文字”来“记载事实”的习惯,已渐趋成熟。这类文字是从“单个”的物象(标识)文字向“连字成组”记事文字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广富林陶尊及其“图画文字”(资料图片)